《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

绘就未来文物事业发展蓝图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实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承载中华民族基因血脉。“十五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将迎来怎样的新布局？科技创新如何为文物保护利用赋能……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绘就未来五年文物事业发展蓝图。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日前，就《规划》相关情况，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介绍。

新技术更好支撑文物保护利用

问：近年来，文物领域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文物的防护、保护、研究、管理、利用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文物科技创新工作有哪些安排？新技术将如何更好支撑文物保护利用？

答：面向未来，国家文物局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文物科技创新工作，特别是成功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与文物保护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文物行业科技支撑体系。

在技术研发方面重点突破。重点关注和扶持文物领域亟需的关键技术、材料、专有装备研发，比如，文物建筑隐蔽病害的无损探测，石窟寺、土遗址等岩土质文物的防风化加固，深海高压无光、浅海低能见度等复杂环境中的考古作业，以及文物领域专用人工智能模型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补齐短板。比如，重点揭示不同类型文物的材质、结构和病害特征，系统揭示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各类文物材质劣化的影响机理等。

在应用示范方面加强集成。综合运用人工智能、遥感探测、物联网等多学科技术手段，在文物领域形成更多典型应用示范。比如，服务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支撑重点石窟寺的防风化加固等。

各级各类文物建筑如何保护利用

问：文物建筑是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数据显示，其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占比61.5%、共3112处，在不可移动文物中占比52.8%、总数超过40万处。《规划》对各级各类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作出哪些安排，未来五年将推出哪些具体举措？

答：《规划》对文物建筑保护的任务安排，可以概括为保护第一、全面覆盖、传承优先、深化改革4个方面。

首先，做好重要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组织开展应县木塔、正定隆兴寺、扎什伦布寺、北平图书馆旧址、上海外滩建筑群、广州沙面建筑群等研究性保护工程。同时，深化修缮材料、工艺、技术等研究，推动建立更为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文物建筑保护理论和实践体系。

其次，加强低级别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以民居为代表的低级别文物建筑存量大、分布广。“十五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优化技术、政策和资源供给，推广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利用审批指引，探索保护补偿补助机制，优化技术服务和审批监管，推动降低修缮施工、装修使用等经济和制度成本，让老百姓在老房子里更方便地享受现代生活。

第三，提升文物建筑展示阐释水平。《规划》提出“文物建筑美育空间”新抓手，鼓励因地制宜布设轻量化、易维护的小型专题展陈。同时严控文物建筑周边建设活动，维护历史环境风貌，推动文物与非遗、自然遗产协同保护。

同时，健全文物保护工程制度。以实施文物保护工程质量提升行动计划为统领，从制度规范、技术监督、资质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多措并举提升文物建筑保护管理水平。

破解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问：博物馆是连接历史与当代、文物与公众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备案博物馆7188家，博物馆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规划》用“控制增量、优化布局，释放活力、直达基层”16字概括“十五五”时期博物馆发展思路。后续将如何推进，切实提升博物馆发展水平？

答：用这16个字来规划引领“十五五”时期博物馆工作，目的是着力破解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办人民满意的博物馆。后续将从博物馆建设和博物馆运营两个方面同步推进。

一方面，控制增量、优化布局，就是要求博物馆建设必须科学规划、规模适当，经济适用、环保节约。

另一方面，释放活力、直达基层，就是要在博物馆运营方面加强统筹、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提升效能。我国7188家博物馆涵盖不同地域、类型、层级和属性，其中，县级以下等中小博物馆有6000多家，不但覆盖面广，而且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点任务，就是要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开展博物馆帮扶机制试点，引导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省级大馆等率先开展帮扶专项行动，推动中小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展览展示、教育服务、人才队伍等方面全面提升。

此外，“十五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全面加强藏品管理，持续开展藏品建账建档、鉴定定级、出入库核验、盘库清点等基础工作，强化全流程动态监管，确保文物藏品安全。坚持系统性保护，强化馆藏文物日常养护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保存环境监测与调控；加强馆藏珍贵文物的病害调查和保存状况评估，分批实施馆藏珍贵濒危、材质脆弱文物保护修复计划；同步推进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加强数字资源采集、管理和利用。

擦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金名片”

问：数据显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已达46项。在《规划》中，也呈现了世界遗产分布图。“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展示阐释水平？

答：“十五五”时期，将以更高标准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展示阐释，进一步擦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金名片”。

在申报培育方面，坚持梯次推进，重点做好“三星堆—金沙遗址”、江南水乡古镇等申报工作，同步培育一批潜力较大的预备项目，谋划好预备名单协同保护路径，形成申遗、预评估、预备名单有效衔接的良性梯队。

在保护管理方面，深入实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计划，有序开展保护修缮、预防性保护、环境整治，深化历史研究、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不断改善遗产本体保存状态，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做好文化遗产周边空间管控，进一步理顺各遗产地管理体制。

在展示交流方面，实施一批展示阐释提升项目，支持各世界文化遗产地深入挖掘价值，提供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推动实现更多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问：文化遗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十五五”时期，在推动文物国际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哪些政策举措？

答：《规划》对此作了详细安排，这里重点介绍其中3方面举措。

一是做好品牌项目，丰富合作载体。深化与埃及、秘鲁、希腊、土耳其等联合考古，推进比较文明研究，贯通丝路文脉，厘清东西方文明交流历史轨迹，共同阐释人类文明。深化文物古迹保护合作，接续开展柬埔寨吴哥古迹、尼泊尔九层神庙等保护修复合作，推进技术交流与人才共育，共同守护文化根脉。深化博物馆交流，实施“文明桥梁计划”，推出系列文物出境展览精品，积极引进世界重要文明发祥地特展。

二是做好追索返还，倡导文明理念。近年来，中国以合作理念贯穿全流程，开展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比如，2025年国家文物局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促成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回归，后续又以帛书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规划》在“拓展交流合作”框架下谋划“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任务，提出了对口馆际合作等具体项目。

“十五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积极联动各方力量，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推动实现更多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三是做好国际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国际治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倡导发起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以下简称亚文盟）。“十五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全力支持亚文盟建设，健全对话协商与项目合作机制，推动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全球文明对话网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本文底图由AI生成

观 古

当千年石刻遇见市井烟火

刘骋　张颖岚

据媒体报道，日前，河南省巩义市文物局局长朱星理谈到宋陵周边群众摆摊时表示：“宋陵‘热’了之后，群众在周围摆摊、卖东西，我们都同意。”在他看来，群众因文物保护而受益，也会更积极地保护文物。不过，朱星理也提到，允许不等于放任，在这个过程中，会坚持“先允许，再规范”的原则。

当千年石刻遇见市井烟火，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却折射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命题：如何既守住历史真实、延续文明根脉，又让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惠及人民群众？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守护文化遗产中共享发展，首先要坚守历史真实，筑牢文明传承之基。以巩义宋陵为例，其陵寝遗迹、神道石刻与周边田野，构成相互关联的历史空间；石刻的形制与排列、陵寝的布局与环境，共同记录着宋代礼制、艺术和社会文化。若只关注石像本体，忽略其所处的历史场域，便难以完整理解宋陵的遗产价值。因此，保护不能止于单体修缮，而要兼顾遗产本体、整体格局与环境风貌。巩义探索“一陵一策”的分类管理模式，体现了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科学思路。同时，应进一步加强考古研究、病害诊断、预防性保护和动态监测，坚持最小干预，真实、完整地保存历史信息，为后世留下可信可感的文明见证。

其次，要深化价值阐释，彰显文化共享之义。文物被看见，不等于历史被读懂；遗产有热度，更要有文化深度。宋陵何以体现宋代国家礼制？神道石刻何以呈现时代审美？这些问题，既需以扎实研究作答，更要以生动准确的方式向公众讲述。可通过遗址展示、公共教育、数字传播和研学活动，让专业成果走出书斋、走进社会，使公众由“看热闹”走向“懂门道”。文化共享不只是增加游客、带动消费，更是让大家享有认识历史、感悟文明的机会，使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亲近、可理解的公共文化资源。

第三，要厚植民生根基，凝聚社会守护之力。文化遗产常与城乡建设、群众生活紧密相连。巩义宋陵周边有序经营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更在于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在地社区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使当地居民从文化遗产的守望者，逐步成为保护成果的共享者和传承事业的参与者。良渚古城遗址东侧的“暖村”，通过村落微更新，引入多元文化业态；泉州古城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通过历史街巷保护和传统建筑修缮，促进历史风貌延续与居民生活改善。这些探索表明，文化遗产不是与现实生活隔绝的真空地带。但经济受益不必然形成保护自觉，仍需完善公众教育、协商参与、利益协调和责任共担机制，将保护成果转化为持久的参与动力。

第四，要坚持依法善治，把握保护开放尺度。文化遗产越受关注，越要敬畏历史、坚守底线。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要求，“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强调防止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商业化。开放不是放任，包容也不意味着降低标准。宋陵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经营活动，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保护规划要求，科学评估设施、人流、消防与景观等影响，明确活动边界与管理责任。尊重群众合理需求，不等于降低法定标准；倡导灵活管理，更不能以事后整改替代事前防范。不同遗产的保护要求各异，但都应以法治划定边界、以科学确定尺度、以精细治理提升效能，方能让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得益彰。

最后，要汇聚社会合力，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跨越地域、行业与代际的公共事业。政府须落实监管职责，科研机构提供专业支撑，学校与媒体推动知识传播，企业依法履行社会责任，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方能形成共建共护的长效机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指向的正是从局部保护走向系统治理、从专业守护走向社会共护。

守护，是对历史的敬畏；共享，是对人民的承诺；发展，是对未来的担当。让真实的历史记忆代代相传，让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公众自觉，让文明传承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将汇聚起赓续中华文脉的磅礴力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北京发布一系列最新考古成果

首次发现隋代长城遗存

本报记者　**施　芳**

日前，第四届京津冀考古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北京公众考古季闭幕式在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举办。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布一系列最新考古成果，其中隋代长城遗存系首次发现。

对研究北京早期长城有重要价值

今年8月16日至10月9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昌平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出土陶、瓷、金属质地文物60余件（套），包括建筑构件、生活用品、武器3类，涵盖北朝、隋、金3个历史时期。

大岭沟长城在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后公布认定为北齐长城。通过本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经专家论证综合判定，昌平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的主体时代为北齐、隋代，金代仍有一定的沿用。“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隋代长城遗存，对研究北京早期长城的年代、位置、走向、军事防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研究河北、山西境内的隋代长城的位置与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介绍。

刷新对汉晋造船工艺的认知

2025年11月至12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丰台区永定河故道进行了发掘，发现3艘汉晋时期沉船及相关河道遗存。3艘古船均为平底木板船，船头朝向西南，由艏封板、艉封板、底板、舵板、外板、甲板、空梁、纤木桅座等构成。船头平齐，船身呈细长梭形，整体线条流畅。

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艘船的船身发现多处烙印清晰的篆体“官”字，证明了该船的官方属性。船身不同构件采用了差异化的连接方式，底板间采用“榫板+木钉”连接，外板间以“钩子同口”相扣，外板与顶板间用铁钉加固等，展现了当时成熟的造船技术。

“这些沉船是北京地区古代内河航运的首个实物证据，也是华北地区汉晋时期水上交通考古的重大突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丁利娜介绍，它们也是迄今中国北方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内河古船，刷新了对汉晋造船工艺的认知，为东西文化和技术交流提供了新例证。

西大桥遗址考古发现填补空白

今年3月至9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密云区西大桥遗址开展了两期考古发掘工作，出土各类别文物460余件（套）。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出56处遗迹，包含房址7座、灰坑34座、灶1处、柱洞14个，出土石斧、石刀等遗物。

“该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雪山一期文化，年代距今5000年前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徐旻介绍，此次发现填补了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居址类遗迹的空白，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雪山一期文化的聚落形态、生业方式，以及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材料。

房山琉璃河遗址、延庆南老君堂遗址等相关考古发现也同时发布。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揭示内外城结构、高等级墓葬成组关系；南老君堂遗址的考古发现初步梳理出延庆盆地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文化发展脉络，对北京历史文化溯源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专家共论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日前，为深化史前治水的考古研究，探讨治水实践对早期社会发展模式与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进一步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荆门举行，来自30多家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我国治水实践最丰富的核心区域。本次学术研讨会设置五大报告环节，围绕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展开多区域、跨学科研讨。

研讨会聚焦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研究，整合考古、地学、水利史研究力量，把治水遗存作为解读早期社会的切入点。同时，汇总长江流域最新考古材料，实证史前治水、聚落变迁、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了长江文明溯源的考古实证。此外，研讨会还将田野实地考察与学术研讨结合，将实物遗存与理论阐释联系起来。

本次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基地启用仪式。自1954年考古研究所在京山屈家岭遗址开启了长江中游史前遗址的首次发掘，并于1955年正式组建湖北工作队，与湖北考古兄弟单位合作，先后开展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贡献了考古力量。